

北京大学历史系

执行主编

林华国

郑家馨

1 北大文字学

北大史学

Clio at Beida

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执行主编：林华国 郑家馨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新登字(京)159号

书 名:北大史学 1

责任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标准书号:ISBN 7-301-02255-7/K · 16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9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9.25印张 240千字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定 价:9.30元

目 录

| | |
|----------------------|-----------|
| 我的期望 | 邓广铭(1) |
| 从比较中探索封建社会的运动规律 | 马克垚(2) |
| 去兰西历史限度论 | 郭华榕(23) |
| 关于早期美国黑人的地位及其演变 | 何顺果(41) |
| 未雨绸缪：江户时代经世学派对近代日本 | |
| 世界战略的先期探索 | 宋成有(54) |
| 第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及其走向 | |
| 现代化的趋势 | 罗荣渠(70) |
| 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1911—1949) | 艾周昌(93) |
| 周一良先生是新中国亚洲史学科的开创者 | |
| 之一 | 林承节(109) |
| 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与地位 | 杨立文(120) |
| 论陆贾 | 陈苏镇(137) |
| 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祝总斌(155) |
| 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几个问题 | 张希清(173) |
| 略论明代官俸 | 张仁忠(183) |
| 乾隆朝金川战争中的天时、 | |
| 地势与人心 | 戴逸华立(200) |
| 清初对西藏农奴制度的初步改革 | 金顶兵(219) |
|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人 | |
|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 孙森(233) |

为史学长青尽力——纪念北京大学

| | |
|---------------------|----------|
| 历史学系九十周年..... | 田余庆(250) |
| 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 | 牛大勇(254) |
| 英文作者简介与内容提要..... | (269) |
| 编后..... | (283) |

Contents

| | |
|--|-----------------------------|
| My Expectation | <i>Deng Guangming</i> (1) |
| Explorating by Comparison the Patterns of Activities of Feudal Society | <i>Ma Keyao</i> (2) |
|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French History | <i>Guo Huarong</i> (23) |
| On the Social Pos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Afro-Americans | <i>He Shunguo</i> (41) |
| Taking Precautions :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n Japanese World Strategy by the Keiseigaku (Economics School) in the Tokugawa Era | <i>Song Chengyou</i> (54) |
|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Third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Its Inclination to Modernization | <i>Luo Rongqu</i> (70) |
| Sino-African Relations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49) | <i>Ai Zhouchang</i> (93) |
| Zhou Yiliang: One of the Founders of Asian History Studies in P. R. C. | <i>Lin Chengjie</i> (109) |
| On the Function and Position of Oral History in Historiography | <i>Yang Liwen</i> (120) |
| On Lu Jia | <i>Chen Suzhen</i> (137) |
| <i>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i> <i>Tao Yuanming's Pastoral Poetry</i> | <i>Zhu Zongbin</i> (155) |

| | |
|--|--------------------------------|
| Several Problem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 <i>Zhang Xiqing</i> (173) |
| On Officials' Salary in Ming Dynasty... | <i>Zhang Renzhong</i> (183) |
| On the Jinchuan War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 <i>Dai Yi and Hua Li</i> (200) |
| Early Qing Government's Preliminary Reform on the Tibetan Serfdom | <i>Jin Dingbing</i> (219) |
| The Founder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Commemorating Guo Moruo's Centennial Birthday | <i>Sun Miao</i> (233) |
| Speech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 <i>Tian Yuqing</i> (250) |
| A Brief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td><i>Niu Dayong</i>(254)</td> | <i>Niu Dayong</i> (254) |
| Authors and Summaries | (269) |
| Postscript | (283) |

我 的 期 望

邓 广 铭

《北大史学》问世了。

北京大学的史学系，已有九十年历史。多年来，系里的同仁每每希望能办一个治史的园地，以便随时刊布同仁们对于史事的意见，探索和考订某些史实的确切情况和深层内涵；既可以相互鞭策促进，又可以反映我系的教学与研究水准，还可以与国内外同行切磋砥砺。文革前，在翦伯赞先生主持下，曾办过《北大史学论丛》，可惜在十年内乱期间被迫停刊。现在，《北大史学》又开始办起来了，我对此感到欣慰，更希望这个园地能扎实办下去，越办越好。

当前，改革大潮正全面冲击着我们这个社会。这冲击，有美好的机会，也有严峻的挑战。对于史学来讲，在一段时间里，恐怕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但是，从另一面看，在一定意义上，《北大史学》的创办，正是我系同仁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回应。

直面挑战，抓住机会，使北大的史学和中国的史学，破浪而起，相连不断地走向更高的层次。我以为，这正是我们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责无旁贷，我们要努力。

(邓广铭 190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比较中探索封建社会的运动规律

马克垚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业生产、农民经济与地主经济、以及城市诸方面，对比封建时代中国和西欧的情况，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中国的单纯种植业和西欧的耕牧结合农业是否导致二者发展不同，中国的精耕农业与西欧的粗放农业究竟各有何利弊；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都不是单纯的自然经济，而有商品经济的成分。但它们的经营原则，和市场关系均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无论东方或西方，封建城市在经济上均是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注意从城乡结合上研究封建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历史系多年讲授世界中古史，总要遇上东、西方问题（这一提法不很准确，只是沿用一种习惯说法）。即中古西欧的历史有自己的规律，自成系统，言之成理。而东方各国则与之不相一致。多年来史学界不断批判西欧中心论，反对以西欧的模式为整个世界史的模式，可是时至今日，中古史上的东、西方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难以对这一段历史作出统一的深入说明。

东、西方问题是世界史上的一大问题，它贯穿于整个世界史的行程，涉及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规律性等问题，对它的回答也

各不相同，有很多的理论、假说。即以前资本主义时代而言，我国教科书中目前仍采取五种生产方式说，即认为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大体上仍按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推进（当然也不乏例外）；有的主张古代世界只有封建社会而无奴隶社会（希腊、罗马属例外）；也有的主张一元多线说，即各国历史发展的模式自古以来即不尽相同。这一问题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它不但是一个历史问题，理论问题，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还涉及到如何估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前途问题，所以值得深入研究。

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西欧各国并不相同，东方各国则差别更大。因袭下来的关于东、西方社会不同的说法，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不尽准确、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因此我们应对各国的历史深入研究，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来，并通过相互的比较，总结出它们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各国历史的共同点与特点。

通过相互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事物。以下即把我在中古史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比较的方法提出来。许多问题并无答案，而是想引起注意，求得解答。比较的两方多为中国和西欧。这不仅因为中国人终究对中国史略有了解，而且古代世界的中国和西欧，地处亚欧大陆两端，其发展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如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几乎同时雄踞大陆东、西两端，以后两大帝国同受少数民族袭扰之苦，陷入分裂混乱。而15、16世纪又同时向海洋大发展。所以现在许多西方史家也很喜欢拿中国来和西欧比较。

—

中古时代的生产当然以农业为主，但中国和西欧的农业长期以来即有所不同。中国很早实行精耕农业，有一套比较科学的耕作

技术，农具也较齐全；所以单位面积产量高。西欧则实行粗放耕作，广种薄收，因施肥不足土地不能连年种植而要实行休耕，所以单位面积产量也低。据李约瑟估计，西欧产量为种子的3—4倍，中国为20—30倍。^①

中国农业的另一特征即为单纯种植业，主要种粮食作物。耕畜和供肉食用的鸡、猪等多为圈养，不占据广大空间。而西欧的农业则是一种农牧结合的混合型农业。乡村多附有草地、牧场以饲养耕畜及羊群，供肉食穿衣之需。

中国自古以来粮食产量高，这往往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但产量高并不表示劳动生产率高，如果这种产量是在一小块土地上投入很多劳动才取得，其劳动生产率也许比广种薄收的农业还更低。所以还必须从劳动生产率上进行计算。中国农户古代有一个理想的耕作面积，即百亩之田，但亩积历代不同。如在周代，则约合今29市亩；如在汉代，约合69市亩；如在唐宋，则大体为90—100市亩（据梁方仲）。英国小农也有一个标准面积，即一户有耕田1 virgate（威尔格）^②合30英亩，折合180市亩。如实行三田制，每年耕作120市亩，如为二田制，则每年耕作90市亩。所以，中西农户耕种的面积似乎大致相同，即使按周代亩积计，中国农户耕田为英国的1/3或1/4（每户人口数大致相等），中国农民所产的粮食也不会低于英国农民，因为李约瑟估计的产量中国为西欧的5—7倍。

以上的估计当然很不准确，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比较实际的计算。据科斯敏斯基等人的统计，英国中世纪一个标准农户有耕地16—20英亩，实行三田制时，其耕作面积为8—14英亩，折合48—

①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 Vol. VI, pt. 2, Cambridge, 1984, p. 7.

② 1 virgate = 1/4 hide (海得)，海得指盎格鲁萨克森时期赡养自由农民一家的土地，约60—120英亩，各地不等。

84 市亩。中国宋代的乡村下户，其占有土地大致在 20—50 市亩之间。^① 每户人口，中、西大体上都是相当的，如以每户 3 个劳动力计算，中国宋代亩产量取 200 斤，则每个劳动力年产粮为 $50 \times 200 / 3 = 3300$ 斤或 $20 \times 200 / 3 = 1330$ 斤。英国产量每英亩按 8 蒲式耳计，则每市亩产量为 68 斤，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 $68 \times 48 / 3 = 1088$ 斤或 $68 \times 84 / 3 = 1404$ 斤。中国每个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仍比西方高。这也证明，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并不是靠人力众多维持，而是有其先进耕作技术内容的。

单纯种植业与混合型农业之不同所引发出来的发展问题就更多了。首先就是造成饮食结构不同，中国人多吃粮食，靠碳水化合物维生，而西欧人多吃肉，靠动物蛋白维生。今天我们知道，要多少斤粮食才能转化成一斤肉，所以吃肉要比直接吃粮食费。也就是说，即使土地面积相等，东方、中国也可较西方支持更多的人口。亚洲、中国虽然粮食产量高，可是人口密度自古以来就大，即亚洲、中国的人口增长快。中国的家庭模式是扩大家庭，西欧是核心家庭；中国的家庭模式利于繁殖人口，西欧的利于节育。此外，中国伦理追求多子多孙，西方重个人主义，不喜子女多。亚洲人的策略是尽可能增加人口，以适应经常发生的灾难造成的死亡高峰，从而在灾难之后仍存活下来。欧洲人则是因为生活在较稳定的环境中，生育多了并无好处，所以转向节制人口等。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首先是饮食结构不同究竟何时开始，是否古代即如此。大量研究都证明，中世纪西方广大农民生活很苦，主要食物是大麦、黑麦。小麦是奢侈品，一般不吃而拿来出售以交纳租税。蛋白质靠吃豆类补充，所以豆类被称为穷人的肉食。农民很少能吃到肉，有人估计一星期只有半磅。^② 而中国古代的肉食

^① 曾琼碧，“宋代的乡村下户”，《宋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65 页。

^② 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89 页。

也并不少，李约瑟注意到这点。中西饮食结构的差别，大约是在近代才造成的，古代低下的生产力还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差别。

关于家庭与人口问题中国方面的研究还不很精密细致，但初步探索也和西方学者所持见解不同。中国的家庭自古以来仍以小家庭、核心家庭为主，大家庭是很少见的。四世、五世同堂之类，大概只是地主阶级家庭的个别现象。至于追求多子多孙，则大概古代世界因天灾人祸很多，死亡率高，一般都会产生这种想法。英国直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习俗仍然是妇女应服从男子，呆在家中管理家务，多生孩子。名史家阿萨·勃里格斯引用的材料说，当时在每6个家庭中就有1个有10个以至更多孩子的家庭。^①但实际上，穷人的家庭因为生活困难，又不愿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中国古代“生子辄杀”的悲剧，可谓史不绝书。宋代百姓为免里正衙前之役，“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② 这都是制约人口过快增长的因素。

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是否较欧洲更快，这更是未曾证明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人口年增长率为千分之十。这与世界人口增长率持平，并不突出。根据英国人口学家麦克伊韦迪等的估算，中国和欧洲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欧洲1300年，人口7900万，1500年为8100万；中国1300年，人口8600万，到1500年为11000万。人数也大致相当。^③ 这都是一种估计，并非精确的计算，不过从这种估计看不能说明双方有太大差别。

应该说明的是，家庭、人口这些问题的研究，今天还不能说有定论。也不能排斥古代中国和西欧有不同的人口规律，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看到有力的证明。

① 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

② 脱脱，《宋史》，第177卷，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97页。

③ 麦克伊韦迪等，《世界人口历史地图》，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8,192页。

单纯种植业与混合型农业所造成的另一发展不同，即有人主张由于耕牧结合，西方农村中羊、羊毛产量很多，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优越条件，证之以英国资本主义从毛纺织业开始，尤为显著。但是从中国经验看，资本主义起源，也是明代中叶从江南农村中棉织业、丝织业开始。耕织结合，是中外小农经济的共同特征。中国农村中如果说植棉还属后起，蚕桑则是古已有之，自然与农作紧密结合。而资本主义萌芽由农村中纺织业始，这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农牧结合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在西欧更快成长，还得有细致的比较，严格的论证。

中西农业结合不同，还引申出又一种看法，即西欧实行广种薄收、耕牧结合，所以每个人要求有更多的土地，更广的空间，这刺激了西欧的向外扩张，是 15 世纪殖民远航的一个重要诱因，而殖民远航又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这一论点和前引对家庭、人口的分析一样，都是难以证明的。单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也有很多问题。如果说西欧人要求有更多土地才能生活，促使他们向外殖民。但要注意到开始海外殖民的 15 世纪末年，正是西欧人口下降时期。为何在人口高峰期不向外活动，而到人口下降期才开始扩张呢？如果诚如某些学者所说，由于西欧人要求空间很大，即使人口下降期也表现出这种扩张的要求，那末这种说法又同他们对中国人口增长的估计自相矛盾。如果中国人口增长很快，比西欧的人口增长要快，人口密度也大（尽管中国人均耕地要求比西欧小），那末人口因素不也是要刺激中国人更早、更积极地向外扩张、殖民、寻求新的土地吗？为何在这方面中国比西欧落后了呢？

有的学者为了说明西欧人积极向外殖民，已从 15 世纪追溯到维金人的四处远航。其实在古代，一个国家、民族，向外发展、扩张、殖民，是时常发生的事，其动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当然要重视哥伦布航行所引发的西欧人的远航事业及其对西欧资本主义萌

芽、发展的作用，但我们还应看到当时并不是只有西欧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由东方向欧洲扩张过来，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形成对当时西欧的一大威胁。莫卧儿人南下席卷整个印度。所以 16 世纪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即使明帝国，也并不是郑和航行一停止，海上发展就告终结了。16 世纪东南沿海商人向外发展的势头十分巨大，西太平洋海上事业可说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王直、徐海等人的活动是很值得研究的，他们不就是中国的德雷克、霍金斯吗？所不同的只是明王朝不断剿灭他们，而不像伊丽莎白封德雷克为爵士。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欧中世纪的进步一再肯定，似乎连东方当时比他们先进也不承认了。如说东方的特长是组织、动员广大人力、技术以进行生产，而西欧的特长是在小范围内组织集约性生产，所以 1000—1500 年间西欧的农业是很先进的，有一套综合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林·怀特早就论证过的重犁深耕、农牧结合保证肥料较多，马蹄铁之使用及挽具之改良等。所以说欧洲西北角等地（英国、荷兰）的农业生产率甚至比亚洲的要高，比中国稻田的精耕农业还略胜一筹。当时的西欧人比亚洲人吃的肉多，营养好，拥有的动力（包括畜力、水力、风力）比亚洲人多达 5 倍，有更多的木材，可以炼出更多之铁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东方、中国难于发展是早就注定的了。不过我仍然认为，要否定东方、中国在中古世界的进步地位，恐非易事，凭这些轻率的估量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1963 年出版了他的“表现了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气息”、畅销一时的世界史教科书——《西方的兴起》，25 年后，1988 年重新审视此书时，他指出书中写 1000—1500 年这段历史以游牧民族和西欧的兴起为中心，未以中国为中心是一大缺陷，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发扬光大，使中国的文化、财富和力量达到了一

个新的水平，在4、5个世纪中远胜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地方”。^①这还不失为公允之论。

我认为，500—1500年这段期间，亚欧大陆东端要比西端先进，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只是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落后了。分析这种落后的原因，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二

中古世界的农业经济，主要可分为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两种，让我们先考察地主经济。

一般认为中国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制，而西欧的主要是庄园制，即封建主要自己（或由管家代理）经营其田产。这样一种区分我以为并不准确。西欧庄园制的特征，是农奴劳役制庄园，为此封建主要对其自营地的生产进行管理，使其能正常运转，取得收益。但西欧的庄园经济只是地主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封建主的田产也实行租佃制，有的是实物租（分成制），也有的是货币租。^②中国的地主经济看来很少西欧的那种农奴劳役制庄园。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国封建主也需要有一种自营经济组织，它就是历史上曾出现的分种制田庄。这种田庄主要土地实行分成租佃制，但也往往有由僮仆耕作的自营地及一些其他生产、生活设施，以保证供应。

我想可以把地主农业经济的经营方式分成两类，一类可称为自营式的经济，西欧的农奴劳役制庄园属这一类，中国魏晋时期

① McNeill, W. H., "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25 years",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出版25年后”)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0. 1.

②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章。

僮、奴耕作的田园、屯堡、别墅等属这一类，上述中国的分种制田庄也属这一类。其生产组织特点如苏洵所说，是地主“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①这一类经济的特点，就是封建主对经济的经营管理，涉及其生产过程，用许多直接生产出来的东西来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封建主也拥有相应的生产资料等设备。另一类可称为租佃式经济，即封建主只收取实物和货币形态的地租维生，其经营活动不再涉及农业生产，因而封建主也可离乡城居，变成不在乡地主。但即使在租佃制下，封建主也不是只是简单的食地租者，他仍然要经营各种副业、手工业、商业，以利于其生活及经济的周转。

封建社会中的地主经济被认为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封建主的消费需求，这已经有过许多的证明和论述。过去我们从西欧的模式出发，往往强调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性质，认为地主经济的典型是“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②或则如西欧庄园材料中所说的要制备封建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而忽视了这种经济和市场的联系。最近中外学者大都注意到封建社会下商品经济的重要作用。封建主无论经营何种程度的自营经济，都不能完全满足，而必须要有一定的交换。西欧的一些庄园，在13世纪时和市场交换的量很大，东欧的庄园更是为市场而生产粮食的。所以已有人提出商品经济为封建地主经济的本质组成部分。^③

我们说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表现在地主经济即

① 苏洵，《嘉祐集》，转引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三联书店，1980年，第163页。

② 颜子推，《颜氏家训·治家篇》。

③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